

新时期文学的世纪回眸

——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20周年

曾庆元

作者 曾庆元,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新时期 文学 特征

提要 新时期文学站在时代前列, 自觉地推动历史前进, 在更纯粹的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新时期文学高扬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 文艺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新时期文学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是认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奋斗的普通人。新时期文学在艺术上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出现了不少名篇佳作。新时期文学还主动吸收了外来文化因子, 在尝试和借鉴中, 不断丰富着文学表现复杂的社会人生的手段, 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是新时期文学繁荣最深刻的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 经济的迅速发展, 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出现, 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的落实, 大大地促进了文艺的繁荣。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 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 在艺术表现上, 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 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①

一、新时期的文学站在时代前列, 自觉地推动历史前进, 在更纯粹的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

在此之前的文学, 如解放区文学与“文革”前17年的文学, 一般来说, 都是在革命斗争或党的中心工作推动下取得迅速发展的。作家、艺术家虽然努力追赶时代的步伐, 但文学创作在节奏上相对地滞后于革命斗争。而新时期反映现实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学, 是在没有“作家协会”的布置, 没有权威部门的号召, 也没有文学流派、社团的约定的情况下, 几乎是与党在这一阶段的中心工作同步甚至是超前出现的。中国当代作家作为时代感应的神经, 自觉地以自己的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传统, 然而更深刻的原因, 却是

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作家们迅速作出反应，亦是历史的必然。1976年3月，首都群众以悼念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形式，在天安门广场掀起了一场自发的、声势浩大的诗文运动，参加者达200多万人次，创作、张贴、散发的诗文难以数计，许多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文迅速传向全国各地。这场群众性的诗文运动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这个后来被中共党史称为“四·五运动”的历史事件，以文学形式向钻入党内的反动分子发难并且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威力，这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上都是少见的，其意味十分深长。“四人帮”被粉碎后，当人们还未跳出“文革”噩梦般的回忆，思想还被两个“凡是”紧紧束缚，心有余悸时，短篇小说《班主任》、《伤痕》的发表又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这两篇小说以敏锐的感触，揭示了“文革”10年浩劫对人们心灵的严重扭曲，以及给人们精神造成的难以医治的创伤，在较深的层次上对“文革”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其后不久，短篇小说《神圣的使命》、《灵魂的搏斗》、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铺花的歧路》、《我该怎么办？》等，起而呼应，作品以沉重的笔触，描写了严酷的现实，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巨大的精神震撼。这类作品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伤痕文学”。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此之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党内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恢复，都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开始正视建国后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倾指导思想，追溯它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及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生活与精神的痛苦。1978年初，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黑旗》、《记忆》、《李顺大造屋》、《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及《月食》、《灵与肉》等相继发表，形成了所谓“反思文学”热。这些作品以充分的现实主义精神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以至更远的历史年代，深刻地揭示了党内“左”倾指导思想发生、发展乃至恶性膨胀的过程。作家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那些脱离群众、危害人民利益、竭力推行“左”倾路线的干部；以深挚沉重的笔调，塑造并讴歌了那些为维护党和人民之间鱼水关系而甘愿背负沉重的十字架的无产阶级“圣者”的形象。在社会主义祖国刚刚迈进新的历史时期之际，“反思文学”的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于，它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建国后的思想路线、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吻合之处；一些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作品提出的问题表明，中国不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希望，从而以文学的形式印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改革伊始，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流毒深广，积重难返，所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改革能否成功是有风险的事”^②。改革在生活中引起的震荡和矛盾斗争，很快吸引了作家的注意力。1979年7月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社会的关注。小说描绘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其后，蒋子龙又发表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阴错阳差》等反映改革的作品。这些作品同小说《祸起萧墙》、《乡场上》、《人生》等作品互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改革文学”思潮。“改革文学”的特点是以城乡四化建设为背景，在社会转型时期，以具有现代眼光和开拓精神

的革命者、企业家,或是得到改革实惠后身上开始躁动着主体意识的平民百姓为主角,真实地描绘了新旧观念的对峙和冲撞,改革进程的艰难和曲折,以及矛盾斗争的尖锐和复杂。展示了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及改革给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光明前景。“改革文学”的出现,在当时不仅对改革者是一个道义上的支持,它在宣传新的人生价值观念方面也有导向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二、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文艺创作多样化,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特征

自70年代末结束“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的主导地位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逐渐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改革文学”以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个性各异的改革者形象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是空前艰难而伟大的事业,并以此确定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改革文学”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改革初期作家的笔触集中在对改革的强烈呼唤和对改革的由衷赞颂上。到了中期,作家们开始注视改革中的复杂斗争及其引起的社会震荡,着力表现它对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近期的“改革文学”则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层面,全面地审视改革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探索其正确的走向。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大体上反映了“改革文学”的这一变化历程。张一弓的反映农村改革的系列作品,也紧追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更深层的层次上探讨了改革对社会生活和人所产生的影响。蒋子龙反映工业和城市改革的系列作品也对改革的进程作了全方位的描绘。在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史上,如此自觉地以自己的作品与时代发展亦步亦趋,对社会的革命变革进行追踪式的全景“报道”,为无产阶级事业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的作家,恐怕只有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中才能见到。与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相联系的是新时期文坛上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肃清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党的领导部门对这些作品的出现没有作简单的政治裁决,而是因势利导,充分发扬文艺民主,通过不同意见的论辩与交流,使作家们明白了,揭露社会生活中落后和腐朽的东西,显示文学批判的锋芒,本来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任务。但是,社会主义文学又是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文学,对落后和腐朽东西的批判,必须是为了催促新生的、先进的东西的诞生和成长,必须是更好地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旧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这种讨论无疑也从另一方面突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旋律。

新时期文学中还有一些内涵比较复杂、指向不很单纯的作品,也引起了文艺界争鸣和讨论。除“朦胧诗”的争鸣外,长篇小说《人啊,人!》、《沉重的翅膀》,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争鸣,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都很有意义。对这类复杂的文艺现象的解释,虽然众说不一,至今也未能达成共识,但开展争论对党加强和改善文艺工作的领导,以及如何高扬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是有积极作用的。

新时期文学的多样化和丰富性集中地表现在题材领域的空前广阔上。如描写知青生活的“知青文学”,著名的作品就有《蹉跎岁月》、《生活的路》、《呜咽的澜沧江》、《萱草的眼泪》、《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本次列车终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北极光》、《燕儿窝之

夜》、《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的河》、《黑骏马》、《迷人的海》等。有人说：“知青文学在进入《北方的河》与《迷人的海》之后，便失去了特定题材的独立意义”^⑧。这种断言，看来为时过早，叶辛新近创作的《孽债》，把知青生活的影子投射在知青子女的身上，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乡土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不以现实题材为主，而“以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为旨归”的“牧歌型”的乡土文学，汪曾祺的《受戒》“不选择重大题材，不切入现实斗争，只将轶闻逸事……随手撷拾，勾勒出一幅幅风俗画”的“文化型”的乡土文学，何士光的《乡场上》描写“吾土吾民，展示了农村的历史的状况和农民的生存状态”的“写实型”的乡土文学，明显地呈现出不同风格。“市井文学”，以城市小市民的特殊心理及生存方式引起了广大市民读者的兴趣。作家们以小题材、小天地、小人物勾勒出复杂的世态人情，显示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陆文夫推出了《小贩世家》、《美食家》、《围墙》、《井》等颇有影响的作品。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等优秀作品，以特有的京味，把都市中落魄飘零的人们放在世事的浮沉里，将忠奸善恶、人情世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冯骥才的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船歌》、《神鞭》、《三寸金莲》等也给“市井文学”增添了分量。作者把曾是“国粹”的辫子、缠足写入作品，着力发掘其文化意蕴，是很耐人寻味的。

“军旅文学”取得重大进展与突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山魂》、《沙海绿荫》，刘亚洲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两代风流》，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刘富道的《直线加方块的旋律》，海波的《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回》，唐栋的《兵车行》，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索伦河谷的枪声》，朱苏进的《射天狼》、《引而不发》、《凝眸》、《第三只眼》、《欲飞》、《绝望中的诞生》和《炮群》等作品，在表现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就有战争这一“永恒”的主题时，充分展示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社会主义特色。这些作品在揭露敌人残暴虚弱的本质，表现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及其必然胜利的趋势，赞颂无产阶级军队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也真实地描绘了普通军人的平凡性格，表现了他们在战争与和平、生与死、对生活的热爱与义无反顾地献身精神之间的抉择和由此产生的思想情感的撞击，使“军旅文学”在保持崇高的基调上，增添了悲壮的色彩。“军旅文学”对军内矛盾的大胆触及和对从人性视角与文化视角对军营生活的透视，都在更深的层次上丰富了“军旅文学”的内涵。

此外，所谓“新潮小说”、“实验戏剧”、“朦胧诗歌”在新时期文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如王蒙的《夜的眼》、《布礼》、《蝴蝶》、《风筝飘带》，宗璞的《我是谁？》、《泥沼中的头颅》，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王安忆的《小鲍庄》及《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莫言的《红高粱》、《透明的胡萝卜》，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马原的《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洪锋的《极地之侧》，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等等，成功地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表现手法（意识流、荒诞、超现实、象征、变形等），扩大了文学表现复杂社会生活、复杂人生的能力，给新时期文学和读者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当然，其中有些作品对形式和结构的过分追求，以及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脱离了生活，疏远了读者，路子越来越窄，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朦胧诗”的悄然隐退，“寻根文学”的

平静消逝,都说明了文学最终是不能疏离现实,不能无视读者的。

历史小说的繁盛,是作家摆脱借古喻今的老套,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发掘其新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结果。《李自成》的后4卷,《星星草》、《少年天子》,以及《金瓯缺》、《孔子》都是有广泛读者的佳作。

在新时期的文学样式中,迅速反映了时代变革、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是报告文学。老作家徐迟的《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刑天舞干戚》、《生命之树常绿》、《向着二十一世纪》等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些作品第一次赞颂了科学家和他们的工作对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生动地刻画了他们勤奋、真诚、质朴的品格,以及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还有争论的情况下,这些作品形象地表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黄宗英的《大雁情》、《小木屋》,理由的《高山与平原》、《依傍田野的小屋》、《痴情》,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柯岩的《美的追求者》、《奇异的书简》,邓加荣的《记人口学家马寅初》,蒋巍的《大洋的此岸和彼岸》等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的新形象,对于改变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的社会风尚,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报告文学逐渐转向对社会问题的观照和对现实生活的干预。陈祖芬的《共产党人》,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是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作品。《中国的“小皇帝”》、《将军的泪》、《阴阳大裂变》、《唐山大地震》、《志愿军战俘记》、《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作品报导了人民大众关切而又知之不多的真情实况,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中国农民的大趋势》、《蓝军司令》、《市场风云录》、《世界大串连》、《人口大爆炸》、《中国老人婚恋面面观》、《多思的年华》、《北京外汇黑市》、《中国的乞丐群落》、《中国西部大监狱》等都以全景方式反映了新的社会问题,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是中国当代社会改革开放曲折进程的一面镜子,是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中开放得最鲜艳、最灿烂的花朵。小平同志对此曾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赞誉这些作品“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④。在新时期,其他的文学样式,如诗歌、话剧、戏曲、曲艺、儿童文学,特别是影视文学,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新时期文学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姿、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除了这一时期各级文艺部门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以外,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放手让作家们自由竞赛,使其作品经受社会、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新潮文学”中一些作品对性本能的过分张扬,“寻根文学”从人的原始本性去探索其深埋的文学意蕴,“朦胧诗”的玄奥晦涩等都曾引起过“轰动效应”,但热闹过后,没有任何行政干预,便很快沉寂下去,都是文艺自身发展规律发挥了作用。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⑤有正确的文艺政策,按规律办事,这是新时期文学繁荣兴盛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三、新时期文学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鼓舞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神圣使命，新时期文学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新时期文学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与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相比，首先是“新人”的范围扩大了，除了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以外，还有平凡朴实的普通人（如《人到中年》中的眼科医生陆文婷、《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等），获得了现代意识的农民群众（如《乡场上》的冯么爸、“陈奂生系列小说”中的陈奂生等），以及在科技领域辛勤耕耘的知识分子（如有关陈景润、李四光、周培源、茅以升等人的报告文学）。

新时期的英雄人物与以前的文学中的英雄人物相比，其面目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他们身上充溢的主要不是理想的英雄主义精神，而是对“全新事业”的执著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生活态度。他们面对的多半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裹缠不清、是非不甚分明的陈规陋习、思维定势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新时期文学不可能以铁腕手段、快刀斩乱麻的作风来表现他们的英雄本色，而只能在韧性的战斗中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乔光朴是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第一个英雄形象。他立志改革、果断刚毅、有勇有谋，但他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去冲破由历史的惰性和习惯势力编织成的大网的束缚，在荆棘丛生的路上努力开拓、进击。车蓬宽、曾淮（《开拓者》）、解净（《赤橙黄绿青蓝紫》）、牛宏（《锅碗瓢盆交响曲》）等被人们称之为“开拓者家族”的成员，都是有献身精神、屡挫屡起、业绩斐然的英雄人物。但在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他们既要迎接外部势力的挑战，又要超越自己，慷慨之中又不免透露出奋袂前行者的悲壮。因此，“改革者形象系列比‘十七年’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系列呈现出更饱满的生活内容，更丰富的性格棱面，更宽宏的心理空间”^⑥。与以前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新时期的英雄人物没有超凡脱俗的色彩，不是“高、大、全”那样的完人。他们都是普通的人，甚至是有缺点、毛病的人。像《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就是一个所谓的“后进”的青年战士，当需要为祖国而献身时，她虽然对生命和青春无限留恋，但她还是毅然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类似的英雄人物还有《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亚细亚瀑布》中的陈隆华、《兵车行》的上官星等。他们并不是天生的英雄，甚至在他们完成英雄壮举前的那一时刻，他们都还是普通人，是伟大的事业，是特定的环境造就了他们，使其显现出平凡人的伟大的一面。唯其如此，这才是属于群众的英雄。新时期英雄形象，不仅是对以往文学中“新人=英雄”创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传统的“英雄观”的一个突破。

在新时期文学中，“社会主义新人”的含义，是从中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来界定的。他可以是乔光朴那样的改革英雄，也可以是李铜钟那样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革命圣者；他可以是陆文婷那样背着生活的重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普通医生，也可以是冯么爸、陈奂生那样在新生活的冲击下，开始同传统观念告别的朴实农民；他可以是刘毛妹那样为国捐躯的“有缺点的战士”，也可以是陈景润那样近乎傻气的执著追求科学真理的知识分子。因此，“社会主义新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也不是远离群众的先知，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成熟到能洞察一切的革命家，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开始了解社会主义，认定社会主义道路，并决心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普通人。新时期文学显现的这

一特点可以说是现实的人的发现,也表明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四、新时期文学突出了文艺的审美娱情作用

新时期文学在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继续强调文艺对人的教育鼓舞作用的同时,突出了文学的审美娱情作用。这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新时期文学的艺术性有了普遍的提高,出现了不少耐读、耐看的名篇佳作;二是美文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重视。

新时期文学紧跟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伤痕文学”从揭露“文革”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到反思“文革”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改革文学”从呼唤改革到审视改革自身;“知青文学”从对往事痛苦的回忆转向新生活的向往、奋斗;“军旅文学”对“军内无冲突”论的突破到对军人个性人格的张扬……这些既是对生活本质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也是艺术表现手段、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此外,作家们用历史眼光、从文学视角对现实生活进行观照,不仅给自己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意蕴,也找到了表现这些意蕴的新的艺术技巧。蒋子龙的《蛇神》、杨绛的《洗澡》、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张炜的《古船》、刘心武的《钟鼓楼》、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都在艺术技巧上作了成功的尝试。如《钟鼓楼》的作者把饱经沧桑的钟鼓楼看作一个历史老人,它总是以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京都市民生活的起伏、习俗心理的演变,努力从凡人小事中挖掘出传统文化的复杂内涵。为此,作者在结构上着意经营了一番,他将几代人的生活压缩在一个白天的时间内。空间则集中在钟鼓楼下、四合院内。这种“花瓣式”的结构,实际上是对人物、事件作了戏剧化的处理,即在高度集中的时空里来展示纷纭的世态和复杂的性格,使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与很强的观赏性。

所谓“美文学”,这里主要是指那些不以重大现实题材为内容,不从政治视角评判生活,专意营造艺术氛围,着力追求某种艺术趣味的文学作品。美文学在新时期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对以往文学中过于重视教化作用的反拨,也有对当今文坛“朦胧后”反文学、张扬丑恶的厌恶;既有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之后想“轻松”一下的需要,也有人们对诗情画意的渴求。

80年代以后,在文坛上蔚成风气的“乡土文学”可算是美文学的一个重要成果。代表作家是刘绍棠和汪曾祺。刘绍棠的小说富于传奇色彩,人物性格侠义爽朗、古道热肠,作品追求故事情节的腾挪跌宕,有浓郁的田园风格。汪曾祺的小说偏重于逸事轶闻的记述,在轻描淡写中表达其中深藏的文化意味,人物有天真纯朴的意趣,情境有清醇淡泊的美感,为文常在平凡和不经意之处翻出新意,十分耐人寻味。

“市井文学”中有一类以小题材、小角度、小人物来勾勒世风人情,显现时代变化的作品,也具有“美文学”的特点。如陆文夫的小说《小贩世家》、《美食家》,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冯骥才的《雕花烟斗》、《神鞭》等。这类作品往往将旧闻趣事置于现代生活的环境中来描写,在市井的图画中来展示历史与现实的交接、新与旧的碰撞,在亦真亦幻、似古似今的情境中来揭示极尽世态的众生相。市井小说较强的文学意蕴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使它拥有广泛的读者。

五、新时期文学在开放的环境中吸收了外来文化因子，创作了不少带有试验性的文学作品，这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来文化对新时期文学的冲击，首先表现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重新被引进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西方工业社会到来之后，以西方非理性哲学为理论基础，表现两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文明与人性的尖锐对立，人们失去信仰，灵魂无所依傍，努力寻找人生家园，而又面临无可逃遁的精神贫困的一种文艺思潮。它以前卫、先锋的姿态，全面地否定文艺的传统，提出了许多令人惶惑不安的艺术主张，并以此造成了世界影响。“五四”时期，中国文艺界曾翻译、介绍过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二三十年代在创作上还出现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以洪深等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戏剧，以穆时英、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小说。但都未能成气候，那时中国的现代主义作家还不能脱出“仿作”的桎梏，其作品“不仅模仿别人而且模仿自己”^⑦。80年代初期，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文坛上重新掀起波澜。先是以朦胧诗的争论发端，随后是三个“崛起”（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开路，继而是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推波助澜，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才形成了声势。作为呼应，小说界首先由王蒙以《蝴蝶》等6个中短篇小说显示了实绩。这些小说抛开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格局，突破了小说以塑造典型形象为目标的旧套，以一种情绪、感受的渲染来“探索人的心灵的奥秘”取得了成功。谌容的《人到中年》以人物在半清醒状态的意识活动为线索，把梦幻与现实、理想与愿望交织在一起，生动地表现了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小说《懒得离婚》中散点透视的结构，《减去十岁》的荒诞构思，《太子村秘密》的推理手法都运用得很成功。张洁的《鱼饵》以象征、荒诞的手法来描写生活中价值观念的混乱。宗璞的《我是谁？》、《蜗居》则以夸张的变形来表现环境与人的对立。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你？》、《最后的停泊地》在意识的流动中让个人的苦闷与现实历史发生撞击。这些创作上的成功尝试，都扩大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影响。但严格说来，这些作品还不是纯粹的“现代派”的作品，其创作倾向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只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现代生活的需要，合理而成功地吸收了现代主义文艺的技巧、手法，以表现日趋复杂的社会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试验，不过是扩大了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的能力，丰富了描写人物的手段。“实验话剧”、“探索戏剧”《屋外有热流》、《魔方》、《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挂在墙上的老B》、《潘金莲》、《绝对信号》等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戏剧观念，给戏剧美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但在根本上又都没有脱离传统戏剧的轨道。应该肯定，这种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因子，丰富、补充自己的民族文学的路子是正确的。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盲目崇拜、刻意模仿相比较，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在借鉴现代主义文艺观念和技巧方面走得比较远的是所谓“城市文化派”和“人性意识派”、“新感觉派”和“结构主义”。“城市文学派”以刘索拉、徐星、王朔为代表，其作品的特点是张扬个性主义，以讽刺、幽默、戏谑、调侃的笔调，来表现一部分以近乎嬉皮士的态度对待社会人生的城市青年的生活和心态。他们的作品对传统、理想、道德的嘲弄，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对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认同倾向。“人性意识派”的代表作家有王安忆、刘恒等。

“人性意识派”是新时期文学中主张从社会学观念向人本观念转化的一种文艺思潮。他们主张超越人的社会层面,来表现人的本能的潜在力量,具有强烈的人性意识。这一思潮的产生,对“文革”压抑、摧残人性本来具有批判的意义,但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观念的影响下,他们过分地看重人的自然属性,过分地张扬性本能,使他们的探索走到另一极端。“新感觉派”在毫不遮掩地表现人的原始生命力方面,可以说是“人性意识派”的继续和发展。其代表人物是莫言和残雪。这一派有影响的作品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红蝗》、《污水上的肥皂泡》、《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等。新感觉派对现代主义借鉴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是以心理真实显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以时空的任意性来组成灵活自由的叙述方式,随心所欲地将梦幻变成历史,将历史化为现实,小说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无所不能的有生命感觉的载体。然而这一派的作家对现代主义价值观念的吸收似乎多于对艺术技巧的借鉴。残雪作品中那种形而上的超前的焦虑、惊恐等感觉显然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西方现代哲学。其意蕴使读者感到生涩、难以索解。这种“本源”处的不足,注定了“新感觉派”有限的生命力。“结构主义”的代表作家是马原、苏童、格非等人,主要作品有《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大师》、《极地之侧》、《瀚海》、《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结构主义者们拒绝对世界固有本质、意义、价值、目的的确证,崇拜感觉的世界,认为世界的意义是人感觉到后才赋予它的。从这一点说,“结构主义”又是“新感觉派”的延续。结构主义小说编织的都是些“无所谓的故事”:死是无所谓的,爱是无所谓的,因而世界是无所谓的。“结构主义”对人生意义的彻底消解,表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已经画上一个句号。结构主义甩开了一切社会束缚,来突出小说的技巧,使小说的叙述达到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地步,虽然扩大了小说写作的自由度,但这种近乎玩故事魔方的方法,也逐渐使人感到腻味。“现代小说实验到了结构主义,无论是人本观念还是小说技巧,都达到‘极地’,因而一次新的反拨又不可避免了。”^⑧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艺现象,它能否在中国扎根立足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新潮小说、戏剧对它的引进、借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文艺界并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匆忙地下结论,而是让作品去经受社会、读者和时间的检验,由艺术规律决定它们的去留取舍。这样做既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精神,也保证了新时期文艺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新时期文艺绚丽多采,灿烂辉煌,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最重要的一章,它的前景无比辉煌。这一点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所说的“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现在我们面前。”

注 释:

①②④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13、42、146页。

③⑥⑧ 《中国当代文学史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40、421、501页。

⑦ 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责任编辑 张炳煌)